

## 抗战时期 粤港地区文化活动

粤港澳地区既是战时中国文化长链条的关键一环，也是中国战时文化中心区之一。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等地大批文化人撤退到粤港澳地区，与当地文化人汇合。随着时局的变化，粤港澳地区先后形成了广州、曲江、香港、东江等多个战时文化中心。

武汉、广州沦陷后，大批文化人转移到香港和曲江。中共香港党组织重视文化在统一战线和抗战宣传中的作用。其中，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大众生活》《笔谈》《时代文学》等进步出版物远传至东南亚等地，建立起针对海外华侨华人宣传的文化据点。

在粤北，党组织积极领导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占领和开辟了粤北抗战文化阵地，使原本比较落后的粤北山城曲江，随着大批文化人的到来和“文化入伍、文化下乡”运动的展开，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文化据点和广东战时文化中心。

香港沦陷后，香港文化人进入内地途中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停留，随后多方文化人士在东江抗日根据地汇流。粤港澳地区文化人以笔为枪，通过文化阵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展现出具体而多彩的粤港澳战时文化历史图景。

### 专家点评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蓝：

### 重温文艺经典 体悟伟大抗战精神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梁善茵



黄新波《他并没有死去》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粤北和香港等地文化抗战及其作用？

林蓝：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领导和影响了粤港澳地区抗战文化事业和反法西斯文化事业，为中国现代文化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作出了重要贡献。

艺术前辈们以笔为刀，把舞台视作战场，将抗战热情融入艺术创作中。其中黄新波、胡根天等前辈，他们都曾在粤北工作，以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和文化实践，持守中华民族本色，激励全民抗战斗志。

羊城晚报：广东美术在抗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体现岭南画学、广东文化的精神？

林蓝：岭南画学在诞生之初即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在艺术上倡导革新，强调关注现实人生，这在抗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百年前民族危亡之际，高剑父先生创作的《东战场的烈焰》，聚焦一二八淞沪抗战，描绘了日军炸毁上海闸北东方图书馆，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广州沦陷以后，关山月先生创作长卷《从城市撤退》，这不仅是艺术家个人在广州沦陷以后的逃难经历，更是战时中国沦陷区城市民众苦难的缩影。

广东美术家更在动荡烽火里，守正中华文脉。广东近现代美术教育先驱胡根天先生，在战时辗转韶关曲江等地，在粤北建立起战时艺术馆博物馆，征集战时流落在民间的国家文物，收获了古物数百件，珍贵图书数千册。这些国家文物在战后得以重聚，博物馆也成为战时的“文化后方”。

羊城晚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广东文艺界将如何回顾历史，为当下来带启示？

林蓝：今年以来，我们正筹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展览”。展览汇聚数百件体现广东文艺工作者以笔当刀投身于抗战事业的原作，全方位展示美术、音乐、摄影、电影、文学、戏剧等多种艺术门类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们在反抗外敌侵略和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卓著贡献。

这些“染着硝烟的艺术”，系统全面地展现广东文艺工作者的抗战历程与成果，它们既是对侵略暴行的无声控诉，更是民族精魂的艺术熔铸。

我们希望和观众一起回顾这段历史，回顾这些创作者从烽火中的艺术经典。从抗战题材经典文艺作品的背后故事中，重温抗战历史，铭记历史警示，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让艺术所见证的苦难，化作守护和平的精神长城。



中共广东省委粤北省委历史陈列馆里，展示着烽火岁月里的文化力量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 文化入伍，他们以笔为枪

粤港抗战文化精神丰碑永伫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广东，广东，是我国的边防，是我国的生命线。三千万人齐奋起！奋起！”位于广东韶关的中共广东省委粤北省委历史陈列馆里，一本内页泛黄、被翻得卷毛边的《抗战新声》歌谱里，记录了54首抗战歌曲。其中的《保卫大广东》歌词雄壮有力，读起来激昂满腔，让听者仿佛回到80多年前那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多次阐述建立文化军队、开展文化抗日的重要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七七事变后，粤港澳地区先后形成了广州、香港、粤北、东江等战时文化中心。文艺家们在艰苦条件下，以创作观照现实，提振着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为后人留下诸多经典作品。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在韶关走进粤北省委旧址、《新华南》编辑部旧址等红色文化遗存，对话艺术大家、文博馆长，探寻烽火岁月里的文化力量。

## 战歌嘹亮

在韶关浈江区五里亭镇良村，一幢外墙泛黄的泥砖瓦平房，原是粤北省委的“红色祖屋”。展柜、展板里展出的《良口烽烟曲》《战地服务队歌》等歌谱，一度回荡在岭南大地的山水间。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迁到粤北。“在广东省委领导和推动下，粤北成为广东新的抗战文化中心。一首首经典抗战歌曲，唱遍中华大地，成为连接亿万同胞的精神纽带。”韶关市博物馆馆长何露说。

1940年夏，第二次粤北会战硝烟还未完全散去，一四五师政工队负责人何芷和作曲家黄友棣创作了大合唱《良口烽烟曲》。《良口烽烟曲》一经诞生，颇受粤北群众的欢迎。后来，何芷在《〈良口烽烟曲〉旧忆》一文中写道，该部大合唱是她对战争的实录。

同样诞生于粤北后方的，还有抗战名曲《杜鹃花》。早春三月，中山大学哲学系学生方芫芸在韶关乐昌坪石村头漫步时，以火海般娇艳的杜鹃花，勾连战士们浴血杀敌的意象，写下新诗《杜鹃花》。黄友棣读后深有感触，仅用一周时间，创作出一首混声四部合唱歌曲《杜鹃花》。

杜鹃花谢了又开，映照战争年代的离合，犹如中国粤北版《喀秋莎》，先在中山大学师生中唱响，后从粤北传遍大江南北。

## 文化堡垒

“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城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的唯一环境。”文艺理论家周扬曾提出“战时文化中心转移论”。粤北曲江，这座昔日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重要文化据点和广东战时文化中心，便是这一论点的有力例证。

先后移居的内地文化人有数百人之多，包括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蔡元培、梁漱溟、欧阳予倩、戴望舒、萧红、萧乾、端木蕻良等等。在内地来港文化力量的推动下，香港成为武汉、广州相继失陷之后的另一文化中心，成为向海外宣传中国抗战的重要窗口。

同时，中共香港党组织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立足长远，力求争取“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有计划地培养与领导非党员的文化工作干部”，以便更好适应文化人来港工作，使“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

这时的曲江，汇集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粤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广东分会、广东美术学会等文化团体，在大、中学校内也建立了文艺社团。此外，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一队和第七队、第七战区长官编纂部、第七战

区政治部政治大队等抗日文化宣传队也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曲江抗战文化的发展。

文史学者、党史专家袁小伦在其《粤港澳抗战文化史论稿》中介绍，成为广东战时文化新据点的曲江，文化人云集，文化活动频繁，文艺作品璀璨繁星。

这些作品大多刊发于当时中共广

东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

1939年4月1日，《新华南》在韶关（曲江）创刊，刊物编辑部设于罗沙巷8号一幢小楼的二层，成为当时粤北20多家进步报刊之一。如今，该幢小楼已成为浈江区和平路上的两家商铺，车水马龙，颇有大隐于市之感。

在《新华南》编辑部旧址展厅里，展出了《新华南》创刊号封面——黄新波先生的木刻版画《射击手》。作品通过刻画士兵持枪瞄准的瞬间动态，强化“抵抗”的象征意义，契合战时“以刀为刃”的创作理念。

木刻版画因复制便捷、传播高效，成为重要的抗战宣传媒介。“广东籍艺术家是木刻运动的主力军。抗战爆发后，黄新波、李桦、古元等广东木刻家用艺术凝聚起爱国力量。”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席林蓝说：“这些版画作品的肌理粗粝，是艺术家深入抗战前线、在子弹横飞的战场上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在爱国情怀下散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新华南》编辑部旧址展厅里，展出了《新华南》创刊号封面——黄新波先生的木刻版画《射击手》。作品通过刻画士兵持枪瞄准的瞬间动态，强化“抵抗”的象征意义，契合战时“以刀为刃”的创作理念。

在《新华南》编辑部旧址展厅里，展出了《新华南》创刊号封面——黄新波先生的木刻版画《射击手》。作品通过刻画士兵持枪瞄准的瞬间动态，强化“抵抗”的象征意义，契合战时“以刀为刃”的创作理念。